

后殖民视角下拉美自主发展的结构性束缚分析

赵佳文

(同济大学, 上海 杨浦区 200092)

摘要: 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分析了殖民遗产如何持续影响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 旨在探讨全球化时代限制其自主发展的因素, 以及诸多限制因素自我强化的过程。首先, 文章回顾了后殖民理论的概念、产生及发展过程, 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二部分探讨了殖民遗产在拉丁美洲的三大表现, 论证该理论在该地区的适用性及其特殊性。第三部分讨论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三大殖民遗产如何通过“政-经-文-政”的循环在该地区实现再生产, 并持续迟滞拉丁美洲独立发展的进程。

关键词: 后殖民主义, 拉丁美洲, 殖民遗产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23

引言

拉丁美洲作为一个深受殖民历史影响的地区, 其社会、经济及文化结构长期受到西方殖民遗产的塑造。虽然这些国家在19世纪初取得独立, 但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压迫依然深刻地烙印在地区的发展路径中。后殖民主义理论为理解这种持久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批判性框架。后殖民理论起源于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话语的批判, 强调殖民遗产不仅限于历史时期的压迫, 甚至在殖民统治结束后, 依然通过各类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延续至今。尽管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独立后都试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压迫, 拉丁美洲却因其特殊的殖民历史和地理位置, 成为了西方霸权与资本主义结构性压迫的典型体现。

本文旨在探讨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拉丁美洲问题的适用性, 分析殖民主义遗产如何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结构、经济模式和文化认同中继续存在。文章通过分析拉丁美洲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互作用, 揭示了殖民权力延续、资本主义市场结构性压迫和文化话语霸权等因素在拉美社会中再生产及其巨大的破坏力。

一、后殖民主义理论及其演进过程

“后殖民”源自“殖民主义”概念, 后者通常指主权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对其殖民地实施政治、经济及社会控制的行为^[1]。“后殖民”不仅意味着帝国主义时代的结束, 也引申为殖民统治告终后, 殖民主义依然深刻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后殖民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 产生与成型

随着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 后殖民理论逐渐萌芽。心理学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与革命家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等人, 凭借个人经历, 创作了大量反对各类殖民主义的作品, 为后殖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 也为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思想根基^[2]。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受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论启发, 提出了西方如何通过知识和话语来塑造“东方”这一概念的思考。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 标志着这一理论的正式形成^[3]。随后, 这一理论得到广泛关注, 并逐渐稳定下来, 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流派。

作者简介: 赵佳文(2001—), 女, 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为区域国别研究。

通讯作者: 赵佳文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 学术界的社区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以及政策实践的推动, 成为推动后殖民理论发展的关键力量。在这一背景下, 美国大学教授帕特里克·杰克逊 (Patrick Jackson) 提出“规训作用”概念, 指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存在的学术垄断和“认知暴力”^[4]。此后, 非西方国家的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采用批判主导理论反思国际关系的过程中逐渐崭露头角。批评家们提出, 国际关系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 非西方国家的经验和理论同样需要得到重视。在这一理论转变的过程中, 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成为了推动国际关系研究变革的重要力量。然而, 囿于国际关系学科中西方思想的主导地位, 这一时期后殖民理论依然未能形成独立的理论路径。

(二) 第二阶段: 反思与崛起

自 20 世纪末以来, 后殖民理论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并在这一阶段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内涵。随着理论的日益系统化, 后殖民理论本身也开始进行反思和批判。约翰·麦肯齐 (John McKenzie) 从历史视角出发, 批评了赛义德的《东方学》, 并反对将东方主义单纯理解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控制的工具。麦肯齐认为, 东方主义不仅仅是殖民压迫的产物, 而是更为复杂的文化和历史现象^[5]。此举使得后殖民理论在批判性反思中不断自我创新, 展示了理论的生命力。与此同时, 学者们开始整合此前出现的复杂多样的后殖民理论和概念, 并产生了大量总结和概述后殖民理论的学术成果。在这一过程中, 诸如身份政治、全球化等议题的探讨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进入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 在国际关系学科的“本体论革命”中, 后殖民理论逐渐认识到自己是全球国际关系的一部分, 且与全球国际关系思想传统有着有机的联系。它吸收了批判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多种批判性思维, 并通过“中心-边缘”的框架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他国际关系相关领域。这一分析框架展现了不同的世界政治视角, 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 后殖民理论已成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一股充满活力与创新的力量。后殖民理论并未将非西方经验视为孤立的个案, 而是以地方与全球的对话为出发点, 构建了一个更加包容和多元的理论体系^[6]。它与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互动, 促进了知识生产中不平衡现象的改善。

尽管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仍处于国际关系领域的边缘, 但其自我认知和理论体系的完善程度已有显著提升。后殖民国际关系理论不仅从批判西方主导的视角起步, 逐步拓展到更为深刻的主题, 还日益体现出学科间相互联系和交融的特点。后殖民理论始终主张, 殖民主义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 都是普遍存在的。殖民主义及其后果的视角为更加清晰地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提供了理论工具。

二、殖民遗产在拉丁美洲的三大表现

殖民与反殖民话语贯穿了拉丁美洲发展过程的论争。作为西班牙殖民地的特殊历史与作为美国“后花园”的特殊区位使得殖民主义在拉美地区构建出了独特的历史与社会现实。

(一) 政治遗产: 西方权力模式的延续

西方权力的延续呈现出内生性与外生性两种模式。不同于殖民宗主国对非洲的物质掠夺和文化输出, 西班牙在殖民地推行的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使得在宗主国有一定地位的白人留在拉丁美洲发展, 形成了拉丁美洲独特的混血文化。在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中, 特别是那些在 19 世纪初拥有广阔领土和庞大人口的国家, 黑人、印第安人和混血人群占据了总人口的 90% 以上。然而, 在这些国家组织新政府的过程中, 这些群体被剥夺了参与社会和政治决策的权利。控制国家的少数白人精英甚至认为自己摆脱了西班牙王室的立法约束, 开始对印第安人征收新的殖民税, 却没有改变维持黑奴制度的做法。以巴西为例, 黑人仅仅是奴隶, 而大多数印第安人则是来自亚马逊的原住民, 成为了新国家的“外来人”^[7]。在这个过程中, 克里奥尔人实际上扮演了第一与第三世界的中介角色, 使得拉丁美洲的政治形态从诞生起就成为了欧洲模式的自然延伸。西方政治形态完成了在拉丁美洲地区的内生性权力构建。

自 19 世纪初, 美国通过“门罗主义”确立了在美洲地区的霸权地位, 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 通过军事干预、外交压力和支持亲美政府等手段, 持续维护其地缘政治优势。许多受过美国教育的拉美精英与美国保持着

深厚的政治和经济联系，这大大增强了美国对拉美国家在外交、军事及经济改革等方面的影响力。冷战期间，美国通过对古巴、尼加拉瓜、巴拿马等国的直接军事干预及对亲美政权的扶持，限制了拉美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性。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建立美洲国家联盟等区域组织，对推行独立外交政策的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实施制裁和政治孤立。区域组织的构建使得西方的政治形态在后殖民时代的拉丁美洲实现外生性延续。

（二）经济遗产：资本主义市场的结构性压迫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经济现代化概念受到了广泛认可，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旨在推动全球发展议程。这一议程与历史进化观紧密相连，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相同的发展阶段：通过普及技术、促进消费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8]。

在延续西方政治发展模式的拉丁美洲，西方工业社会的标准自然被视为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唯一途径。然而，西方国家的原始资本积累本就建立在对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剥削基础之上，而这种殖民时期经济站位不对等的结构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延续，被卷入自由市场的拉丁美洲地区实际上并不具备实现西方式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对非西方国家的结构性压迫被忽视。而通过这种经济现代化模式，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固化，拉丁美洲等地区作为“边缘”国家，始终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边缘^[9]。

经过拉丁美洲的“失落十年”，拉美学者逐渐注意到了这种深层次结构性不平等，开始质疑发展阶段的线性进程，认为拉丁美洲的“落后”是由其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决定的^[10]。全球经济呈现出“中心-边缘”结构，边缘地区依赖于出口原材料，而发达的中心国家则占据制成品出口的主导地位。这种国际分工模式使拉美国家始终处于全球经济体系的弱势地位，其经济发展受制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需求和规则。在此基础上，依附主义理论进一步指出，拉丁美洲的“落后”并非发展过程中的自然阶段，而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外部经济力量与内部政治结构相互作用的产物。依附主义者认为，世界经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支配关系，以及各国内部的阶级结构，决定了拉美国家的发展路径^[11]。这种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国际经济中的不平等交换，也渗透到国家内部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形成了“外部控制”与“内部统治”相结合的复杂局面。

（三）文化遗产：西方式话语霸权的建构

除了政治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种族”这一概念也作为殖民遗产之一留在拉丁美洲大陆。这一概念源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差异，原本并不存在于美洲的历史中。随着殖民进程的推进，这一概念逐渐被确立为区分不同群体的标签，创造了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人等新的社会身份，基于这一观念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并重新定义了其他群体的身份^[12]。种族身份从简单的社会标签转变与社会地位、角色密切相关的概念，成为殖民统治体系的组成部分和社会分类的核心工具。

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展，欧洲成为了全球新的统治中心，进而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知识视角。被殖民的土著人民逐渐沦为农民和文盲，他们的城市文化和文字被剥夺，陷入了被压制的亚文化状态。大部分殖民地的被征服者无法接触到教育和知识，他们只能使用统治者的语言，并且这种语言仅用于服务于殖民统治者的目的。这样的情况使得他们无法独立表达自己的文化、符号和经验，而只能在殖民者的框架中重新定义自己。殖民地的被统治者被迫接受并“认同”自己在殖民者眼中的身份和历史。他们的自我认同和文化体验被殖民者的视野所主导，不得不在殖民者的框架中生存和表达。这种压迫不仅体现在个人层面，还渗透到整个社会结构中^[13]。尽管这些被殖民的群体不断尝试适应和反抗全球殖民模式的变化，他们的文化和身份始终受制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影响。能够学习统治者语言的精英群体在本土的认知模式与欧洲中心主义之间产生了身份的冲突，无法完全摆脱殖民统治带来的精神和文化束缚。

建立在种族话语霸权之下的文化观念成为殖民者权力合法性的基础，而这一合法性又加深了种族话语霸权，完成了制度与文化的互构。这种视角不仅塑造了拉丁美洲被殖民者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也推动了种族观念的理论化，成为了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之间殖民统治关系的文化框架。

三、殖民遗产的循环再生产

殖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深刻重塑着国际格局。从第三世界到发展中国家再到新兴经济体，南方国家愈发作为重要的行为体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亚洲国家如中国、印度逐渐探索出适合本土的发展道路，并试图跳出西方视角，立足本土价值观重构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同样遭受殖民遗产侵害的非洲也开始尝试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提升自身的话语权。但为何原住民数量庞大、有着深厚本土文明根基的拉丁美洲经过数十年的独立发展依然难以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土的发展道路？本文提出，殖民遗产对拉丁美洲造成的冲击并非是一次性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相互作用，通过“政-经-文-政”的传导路径成为一个无法打破的恶性闭环。

（一）非本土权力结构合法化资本主义压迫

西方政治结构与本土的社会结构在拉丁美洲呈现出一种异质性融合的特征。这种融合不仅是基于地域、种族、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与英美新教文化的精神抽象同质性截然不同^[14]。拉丁美洲的社会结构更为复杂多样，呈现出一种由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融合模式。

然而，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同化，而是一种复杂的过渡过程。传统与现代的元素并存，交织成一种充满矛盾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在于，它并未通过与传统决裂来实现，而是在旧有的社会模式基础上进行渗透。由此，拉丁美洲社会呈现出“三重二元性”的特点^[15]。首先，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深刻的二元分化，城市化进程伴随着暴力的迁徙，形成了缺乏中等城市的社会格局。其次，在农村地区，寡头与农民之间的对立持续存在，社会结构依旧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庄园式的经济模式没有根本改变。最后，城市化进程在拉丁美洲的独特性也表现得尤为突出，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导致大城市内部存在大量从事低生产率服务的边缘群体。这些矛盾的存在造就了拉丁美洲的政治现实，也为随后的经济失败埋下了隐患。

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的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经济现代化模式革新了拉美地区的发展理论。然而，传统的寡头秩序依然存在，政治现代化进程未能有效推进，导致拉丁美洲社会经济结构的矛盾加剧。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促使拉丁美洲的社会精英认识到，国家干预经济、制定社会保障和劳动法是应对工人阶级激进化的必要举措。1929年的经济危机加深了这一认识，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由此造成了政治主导经济的局面^[16]。由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拉丁美洲的社会发展仍然处于被动地位，难以摆脱政治组织模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匹配造成的困境。

西方的社会发展主要以经济为驱动力，逐渐推动了政治和文化的革新，而拉丁美洲则长期由政治因素主导，经济现代化始终滞后，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拉丁美洲的社会结构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处于不对称的状态，进而阻碍了该地区的自主社会发展。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使得拉丁美洲无法真正实现社会的转型，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压迫得以通过殖民的政治遗产在该地区持续再生产。

（二）经济失败固化外部话语

面对失败的经济现代化，拉美精英开始寻求改造民众使之符合西方经济现代化的要求。以西方现代化范式作为唯一标准的结果是西方价值观的全面渗透，经济层面的依赖延续到了文化领域。一些国家在提高教育水平、降低文盲率和改善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社会性别关系也有了一定的改善^[17]。20世纪以来，年轻一代的文化革命获得了一定关注，被视为一种文化突破，并且促使拉丁美洲的城市逐渐被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场域来看待，学术界开始讨论大众媒体在文化依赖中的作用，例如《唐老鸭》这样的文化符号的传播效果^[18]。

在这一过程中，以西方现代化为模版的文化建设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延伸和扩展，单纯作为西方社会的复制品来看，这些建设工作可以说是成功的。然而，过度追求与西方社会的同质性改造使得拉丁美洲特殊性的问题进一步被官方话语忽视。这种局面导致拉丁美洲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依然难以摆脱西方话语的支配，西方标准几乎成了评价拉丁美洲社会和文化的唯一“镜像”^[19]。而处于“中心-边缘”的经济结构外围的拉丁美洲在西方经济现代化主导的话语下自然成为了“负面教材”，而这种负面评价深刻影响着拉美人的自我认知。例如，许多描写拉丁美洲城市动荡的文学作品（如巴尔加斯·略萨（Vargas Llosa）的《城市与狗》《绿房子》）往往描绘了在经济现代化未能实现的背景下失败的拉丁美洲形象。

此外，经济现代化的迟滞在降低拉美国家自我认同感的同时，也使其无法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进一步降低

了民族身份的凝聚力^[20]。拉美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加剧，贫困问题依然严重，许多人无法通过经济手段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使得拉美人民难以形成共识，进而影响到集体身份的建立，使得拉美民众更容易产生自我分裂，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使得拉美社会的身份认同更加脆弱。

这种由外部力量主导的文化审视在拉美构建了西方价值观的底色，进一步削弱了拉丁美洲文化的独立性，加深了该地区对西方文化的依赖，强化了拉美自主发展过程中的西方话语权。

（三）社会文化与政治变革的不匹配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随着“西方崇拜”逐步深化，拉丁美洲的文化西方化进程一路高歌猛进。城市化、教育革命、大众传媒的普及、女权主义、人权运动的权利争取、青年文化和宗教重组等一系列现代化进程取得了显著进展^[20]。在文化领域，拉丁美洲迅速进入了现代甚至后现代的阶段，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得到了充分体现。

这一文化现代化通过多种文化元素的混合与交织，成功突破了现代与传统、国家与国际之间的界限。这种杂交文化的形成不再被视为矛盾的表现，而是被理解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文化表达，代表了内生与外生文化力量的碰撞与融合。这一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观念，推动了文化的民主化，尽管这一进程中仍然存在不平等现象，但平等的价值观已经获得认可。

然而，文化的超前发展与经济和制度方面的迟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并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文化现代化的推动力产生了新的社会需求和矛盾，而经济现代化的迟滞无法满足这些需求，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衡。在这种情形下，高度发达的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给经济和政治的转型造成了压力。智利二十多年来陷入焦灼的关于现代性的争论正反映出这种紧张关系^[21]。经济现代化产生的特定需求、过度负担和挫折感成为拉美社会的一大挑战。尽管文化上有了显著的进步，但其未能与经济和政治结构有效衔接，又导致政治变革的滞后。

在政治领域，虽然有一些积极的变化出现，例如人权革命和从革命到民主的过渡，文化现代化与政治变革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变得重要，但这种联系依旧不够紧密。文化现代化促进了政治领域的某些进步，如女权主义和性别平等运动的兴起，以及新的政治宗教行为者的行动等。然而，政治制度并未能完全适应这些新的文化要求，许多国家仍然面临着旧有的政治结构的约束，如忠诚、恩惠和附庸主义的政治体系依然主导着社会政治。文化现代化激发了新的政治需求，但这些需求往往无法与政治体制的传统结构相匹配，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至此，殖民遗产实现了“政-经-文-政”的循环再生产。

结语

正如后殖民主义所主张的一样，殖民主义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是普遍存在的。殖民遗产并未随着殖民者的军队离开拉美大陆，而是通过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互动不断自我生产，持续侵蚀着拉美国家独立发展的努力。由于拉美殖民历史和地理区位的独特性，拉美国家的自我认知深受西方话语的形塑，而经济上受到资本主义结构压迫，使其成为南方国家中经济失败和政治混乱的典型。近年来，拉丁美洲逐渐开始探索一条适合本土的发展之路，例如制度上持续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经济上以共同利益为主导，主动融入与南方国家的合作；文化上不再一味追随西方国家，开始挖掘土著文化的价值，用“传统性”挑战“现代性”。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对新的国际秩序的不断探索，若拉丁美洲能够打破殖民遗产的恶性循环，将成为共建互利共赢国际体系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 [1] Barker, Jonathan. "Return to the Source, Selected Speeches by Amilcar Cabral." (1976): 166-168.
- [2]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2012.
- [3] Jackson, Patrick Thaddeus. The conduct of inqui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Routledge, 2016, p.9.
- [4] Patrick Jackson, Jackson, Patrick Thaddeus. The conduct of inqui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Routledge, 2016. p.9.
- [5] 同子怡.国际关系的后殖民理论：一种包容与多元的理论[J].国际政治研究,2024,45(03):74-103+6-7.
- [6] Eisenstadt, S. N. (2013). América Latina y el problema de las múltiples modernidades. Revista mexicana de ciencias políticas y sociales, 58(218), 153-164.

- [7] 吴梅云.论后殖民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D].青岛大学,2022.
- [8] Mallorquín, Carlos. "The genealogy of the decolonial perspective in Latin America: The Center-Periphery antinomy." *Estudios Críticos del Desarrollo* 7.23 (2022): 27-74.
- [9] Martuccelli, Danilo. "Problematizaciones de la modernidad y de la moderniz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Desarrollo económico* 60.232 (2021): 253-274.
- [10] Dos Santos,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 (2), pp. 231 -236 .
- [11]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ales, and Raúl Benítez Zenteno. *Las clases sociales en América Latina: problemas de conceptualización*. Siglo Veintiuno Editores, 1977.
- [12] Quijano, Aníbal. "Colonialidad del poder, cultura y conocimiento en América Latina." *Dispositio* 24.51 (1999): 137-148.
- [13] Trucco, Ignacio, and Carolina Lauxmann. "Estructuralismo latinoamericano y sociología de la modernización. Articulaciones teóricas."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86.4 (2024): 963-990.
- [14] Reyna, José Luis. "El desarrollo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en la postguerra." (1967): 291-296.
- [15] Chraki, Fahd Boundi. "Estructuralismo latinoamericano y neomarxistas: el origen del proceso de subdesarrollo de la periferia." *Apuntes del CENES* 32.55 (2013): 9-31.
- [16] Quijano, Aníbal. "Colonialidad del poder, cultura y conocimiento en América Latina." *Dispositio* 24.51 (1999): 137-148.
- [17] Dorfman, A., and A. Mattelart. "Cómo leer al pato Donald." Buenos Aires: Siglo Veintiuno (2009).
- [18] Martuccelli, Danilo. *¿Existen individuos en el Sur?*. LOM ediciones, 2010.
- [19] Quijano, Aníbal. "Colonialidad del poder, cultura y conocimiento en América Latina." *Dispositio* 24.51 (1999): 137-148.
- [20] Martuccelli, Danilo. "Problematizaciones de la modernidad y de la moderniz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Desarrollo económico* 60.232 (2021): 253-274.
- [21] SJ, Eduardo Silva. "Pensar el malestar. La crisis de octubre y la cuestión constitucional." *Revista de Filosofía (Chile)* 77 (2020): 275-279.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n Latin America's Autonomous Development: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Zhao Jiawe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colonial legacies continue to influence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structures of Latin America, aiming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limit the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s well as the self-reinforcing process of these multiple constraints. First,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concept,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ostcolonial theory,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ubsequent study. The second part examines the three major manifestations of colonial legacies in Latin America, demonstrating both the applicability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theory in the region. The third part discusses how the three colonial legac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spheres are reproduced in the region through the "politics – economy – culture – politics" cycle, and how they continue to hinder the process of Latin America'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Keywords: postcolonialism; Latin America; colonial legacies